

中国商业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研究:传承机理与实证检验

邵传林

(兰州财经大学 中国西北金融研究中心,兰州 730020)

摘要:在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背景下,从历史渊源视角考察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决定因素问题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解释中国企业家活动的地区差异特征,还有助于为当前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线索。本文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资料实证测度了作为历史因素的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历史上商业文化传统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拥有丰富的现代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地区,即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为了减弱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可能影响,文章使用建国初期的商业贷款占比、识字率作为商业文化传统的工具变量,IV估计结果再次印证了上述结论。

关键词:历史渊源;现代企业家精神;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

中图分类号:F0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4-0061-10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Business Traditions on Entrepreneurship: Inheritance Mechanisms and Empirical Checks

SHAO Chuan-lin

(Finance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background of a new economy normal, this paper studies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determin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ical origins, which not only helps explain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in theory, but also provides new clues for the current economic growth. The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about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ultural traditions of the business as historical factors on th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Chinese provincial-level unbalanced panel data. Empirical research shows that, in areas with richer business cultural traditions, it is more conducive to cultivate and propagate the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of innovation or venture, namely the inheritance and nurture of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has a clear path-dependent characteristic. In order to weaken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hat may affect the estimation results, this paper uses commercial loans and the literacy rate as instrumental variables of cultural tra-

收稿日期:2016-02-26

基金项目: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金融生态环境和企业家精神双重视角下的创新驱动发展研究”(2015A-090);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甘肃省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金融对策研究”(YB051);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2015年度重点项目“丝绸之路经济带创新驱动发展的金融支持研究”(JYYZ201505)

作者简介:邵传林,男,兰州财经大学中国西北金融研究中心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ditions of the business, and the estimation results once again confirm the above conclus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origins; modern entrepreneurship; entrepreneurship of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of venture

一、引言

发展经济不仅需要产权保护、法治等正式的制度条件,也需要社会规范、文化价值观念、习俗等非正式的制度为商品交易、储蓄、投资、分配等活动提供一个可预期的行为框架。Weber^[1]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宗教改革引起了价值观念的变迁,将追求财富看作是“上帝的召唤”,于是,财富最大化作为一种工作伦理而存在,进而为现代企业家精神和商业精神的流行提供了宗教基础。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宗教文化确实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长期性影响^[2-3]。Weber^[4]发现,中国的儒家文化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具有截然相反的特征,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崛起提供非正式的制度支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韦伯的判断。比如,余英时^[5]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遗产并不能成为解释资本主义未在中国崛起的文化成因,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束缚了商人精神的生成。杜维明^[6]也不同意韦伯对中国的判断。他认为,儒家伦理并不会成为中国商人精神崛起的障碍,恰恰相反,后来产生的新儒家伦理会成为商人精神崛起的基础。韦森^[7]对农耕文化在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发展中的阻滞作用进行了阐释与分析,并指出,地方亚文化是不同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总之,既有的研究表明,文化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不同种类的文化对现代企业家精神具有迥然的影响效果。

中国幅员辽阔,即使是儒家文化对中国31个省级地区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经过数千年的演变,各地区逐渐形成了不同的地方亚文化。比如,长江三角洲地区早在南宋以后形成了“吴越文化”,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了“岭南文化”,山东和河南形成了浓厚的“农耕文化”,内陆少数民族聚集区则形成了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然而,本文无意分析上述地方亚文化的具体特征和形成原因,本文感兴趣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走向市场,不同的地方亚文化在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上是否具有不同的效果,究竟哪一类地方亚文化更能促进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尽管不少学者深入地探讨了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鲜有学者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据资料分析作为历史渊源的地方亚文化究竟如何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发展。

区别于既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文章从以下四个方面做出了新的分析和尝试:首先,立足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说明作为历史渊源的商业文化传统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机理,从而为其他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自洽的研究思路;其次,本文除了在理论上探讨商业文化传统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还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作为历史渊源的地方亚文化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机制,这在国内尚属首次;第三,本文的面板数据模型不仅有助于检验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纵向影响,而且有助于评估商业文化传统的横向差异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迥然影响;最后,本文拟基于历史数据构造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回归(2SLS),进而有效削弱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果的不利影响。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发展

(一) 企业家精神在历史上的产生与演变

根据复旦大学韦森教授的研究,中国各地区早在几百年前就形成了不同特色的地方亚文化,比

如,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吴越文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岭南文化”,中原地区的儒家“农耕文化”^[7]。但是,只有东南沿海地区的吴越文化和岭南文化在思想内涵上比较接近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或现代企业家精神)。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精神为何发源于东南沿海地区?笔者认为,这可能与这些地区历来就人多地少、自然资源贫乏相关。资料表明,在历史上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多以经商为主、农业为辅。比如,作为最早在改革开放之后“释放”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温州地区,早在宋末明初时期就拥有发达的商业活动,该地区经过数百年的商业实践逐渐生成了“重商轻农”的企业家精神^[8],强调“以利和义”和“义利并举”^[9],并且与其他地区相比,温州人普遍具有较强的经商意识^[10]。毋庸讳言,上述地方亚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追求利润的精神是一致的,主张通过商品生产获取利润,这也正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特别发达的重要因素,即上述地方亚文化的重要作用在于间接充当了“资本主义精神”源泉^[11]。

此外,中国各地区于明清时期逐渐形成了商帮文化,如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等五大商帮,秦商和闽商也被列入商帮文化中。其实,“商帮”类似于商人组织,是一种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商业活动网络^[12]。一方面,商帮文化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又传承了旧的宗族文化元素,有效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民营企业群体的崛起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制度遗产^[12]。据研究,种族多样性会通过宗教信仰和种族矛盾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13],并且具有种族多样性的地区往往也是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地区^[14]。根据 Alesina 等^[14]编制的种族多样化指标,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种族多样化指数分别为0.209、0.1063、0.043、0.1455、0.0099,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种族多样化指数分别为0.0558、0.2452、0.7422、0.7517,中国的种族多样化指数为0.233,高于发达国家种族多样化的程度,但要低于“金砖五国”种族多样化程度的平均值。其实,中国也是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国家,拥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等民族地区,民族多样化会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亚文化的生成。有人指出,种族多样化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产生^[14],或者说,与其他地方亚文化相比,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所孕育的“民族文化”可能会对现代企业家精神产生不同的影响。

综上所述,中国各地区并不具有同质的文化特征,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亚文化更接近现代企业家精神,凡是曾经产生过“商帮文化”的地区均有利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但“农耕文化”的影响则相反,民族地区地方亚文化的影响尚不明确^[12]。经过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国各地区早在建国之前就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地方亚文化,31个省级地区的地方亚文化在横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性,这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拟重点考察地方亚文化的商业文化传统维度,并且在后文将采用新中国成立前著名企业家人数作为地区层面商业文化传统的替代性衡量指标^[15],尝试性地进行实证检验。

(二) 企业家精神的路径依赖与历史传承

新中国成立之后,上述地方商业文化传统及传统商业精神在计划经济的管制下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幸运的是,改革开放后地方商业文化传统复兴并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11]。显然,问题的关键不是与其他地区相比现代企业家精神抑或资本主义精神为什么能在东南沿海地区更好地培育与成长,而是为什么在商业文化传统资源较丰富的地区能够更好地促进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成长。厘清该问题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为解释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分岔之谜提供新的注脚,还有助于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与培育提供科学的政策建议。

第一,商业文化传统一经产生便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可知,商业文化传统一经产生便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即使全球化进程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普遍扩张会缩小各种地方

商业文化的差异性,或者说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会使商业文化发生改变,但商业文化的变迁非常缓慢,具有路径依赖特征^[16];不论是个体层面的文化价值观念抑或社会层面的群体性文化均具有明显的可持续性特征^[17]。对中国而言,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到1978年底实施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均按指令性计划配置资源,几乎一切非公有制经济皆被取缔,市场化配置资源的生产方式暂时退出了历史舞台,商业文化传统精神资源也因此丧失用武之地。但商业文化传统及其精神资源并没有彻底被人忘却,而是暂时被湮没,一旦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变革,这种商业精神便迅速复苏。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权力当局逐步恢复了民营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既然地方商业文化具有历史可持续性,难以在短期内被改变或遗忘,于是,在建国之前那些原本商业活动和民营现代企业家精神繁荣的地区就再次成为市场经济活动最繁荣的地区。

第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商业文化传统为当代企业家的创新创业活动奠定了知识基础。尽管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伊始,中国并不具有关于企业如何运营和如何开展市场交易的知识^[18],但是民营经济还是率先在温州、泉州等东南沿海地区兴起,这可能与当地的重商主义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这种商业文化传统为当地群众快速融入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知识基础,而这种知识基础是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先决条件^[19]。因此,当全国其他地区还在对市场存疑或者沉浸在社会主义国家到底要不要发展市场经济的争论中时,这些地区的企业家们早已将其商品打入全国市场,并在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11]。

第三,商业文化传统在现代企业家的创业活动中具有社会资本的功能。根据经济社会学的理论可知,社会资本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它能够为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信任,而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商业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发挥了这种功能。有证据表明,现代企业家创业精神在商业文化传统资源越丰富的地区越容易培育与发展。不仅如此,传统商业文化还传递了一种合作意识或合作信念,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而合作会使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变得更便利、成本变得更低,于是,现代企业家精神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这进而又促进了合作信念的普遍化,它们互为因果、相互促进。总之,作为社会资本的商业文化传统能够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传播提供途径^[19]。

最后,商业文化传统观念通过家庭进行代际传承。历史上经过长时间积累的地方商业文化传统会通过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在代际之间进行传承和发展。既有的实证研究表明,父母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去教给子女那些他们曾经从祖辈那里继承的知识或家风,但不会对这些继承来的知识或家风进行再评价,更不会根据所处的动态外部环境对这些继承来的知识或家风进行修正,再将修正的文化观念传授给其子女^[20]。从子女的角度来讲,家庭中的上一代(如祖父母、父母)会通过“言传身教”对其子女产生深远影响,而家风或家文化是向其子女传递某种价值观念、伦理规范、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常用工具^[21]。譬如,Guiso等通过对美国移民的研究发现,美国第2代移民或第3代移民的价值观念与其第1代祖先保持高度一致,并且,这些传统的文化观念即使在新的环境下或是经过若干代之后仍会对个人的价值观念和看法产生重要影响^[17]。这表明,文化价值观念在家庭中会进行代际传承,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后代都会继承或保存早期的家庭文化传统。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伊始,地方商业亚文化已经传递到了第2代或第3代,由于时间较短,家庭文化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于是,商业文化传统通过家庭组织得以保存。比如,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和周叔弢等人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是知名的民族实业家了,在改革开放之后,其后人也多成为企业家。概言之,商业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念主要通过家庭教育进行代际传承,父母有意做出各种教育选择,选择性地向子女灌输做生意或创业的理念、奋斗精神、吃苦耐劳、冒险意识等商业精神,最终实现了商业文化传统的代际传承与存留。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假说: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 模型与变量

为验证上文的假说是否成立,特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spirit_{it} = \beta_0 + \beta_1 culture_{i0} + \sum_j \beta_j * X_{it} + u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上式中,因变量 $spirit_{it}$ 表示第 i 地区第 t 期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根据李宏彬等^[22]、江春和张秀丽^[23]、李后建^[24]、邵传林^[25] 等学者的前期研究,本文拟用私人企业家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人均数量作为现代企业家精神的替代性衡量指标^[15]。核心解释变量 $culture_{i0}$ 表示第 i 地区第 0 期的商业文化传统,本文采用民国时期各地区著名企业家的数量近似刻画商业文化传统。就理论层面而言,商业文化传统资源较发达的地区往往具有更多数量的著名企业家,或者说某地区著名企业家人数越多则表示该地区历史商业文化资源越丰富^[15]。基于江春和张秀丽^[23]、李后建^[24]、邵传林和韩磊^[26] 等人的相关研究,本文选取并设计控制变量集 X_{it} ,包括实际人均产出(GDP)、市场分割(MFI)、总人口(pop_n)、基础设施(lnroad)、产业结构(struc)、城市化水平(urban)、金融发展(f_p)、地区开放程度(trade)、教育水平(edu)等变量。此外,鉴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播与发展受时间因素的影响,本文在估计模型(1)时还考虑了时间效应 u_t 。上述变量的详细界定见下表 1。

表 1 变量定义及统计特征

变量	代码	含义及计算方法
现代企业家精神	spirit	(私营企业户数+个体户户数)/人口
现代企业家精神	spirit1	私营企业户数/人口
现代企业家精神	spirit2	个体户户数/人口
商业文化传统	culture	民国时期著名企业家的人数
商业文化传统	culture1	1992年私营企业及个体企业的平均数
实际产出	GDP	Ln(人均GDP/不变价格指数)
市场分割	MFI	参见范子英和张军(2010) ^[27]
总人口	pop_n	人口的自然对数
基础设施	lnroad	每万人公路里程(千米)的自然对数
产业结构	struc	第二产业/GDP
城市化水平	urban	非农业人口/人口
金融发展	f_p	非国有企业贷款在总贷款中的占比
地区开放程度	trade	进出口总额乘汇率除以GDP
教育水平	edu	高等学校在校生在总人口中的占比
商业贷款占比	shangye_iv	1949年商业贷款/贷款总额
识字率	literacy	1949年小学和初中学历人口/总人口

(二)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中国1992—2011年31个省级单位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原始数据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需要特殊强调的是,民国时期各地区著名企业家的人数(culture)来自于维基百科“中华民国企业家”条目,由笔者手工搜集,并剔除1949年各地区人口的影响,且采用1992年各地区人均创业户数作为商业文化传统的替代性衡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测试^[15]。另外,金融发展指标(f_p)的设计与张军和金煜(2005)^[28]的研究相似。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对本文观点的初步检验

表2列出了基于式(1)进行回归的估计结果。列(1)仅控制了商业文化传统变量(culture),结果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001,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商业文化传统与现代企业家精神正相关。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总人口(pop_n),结果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的估计系数仍为0.0001,且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商业文化传统独立地对现代企业家精神产生正的影响;列(3)、列(4)、列(5)、列(6)、列(7)依次在列(2)的基础上逐次添加了市场分割(MFI)、产业结构(struc)、城市化水平(urban)、金融发展(f_p)、地区开放程度(trade)等控制变量,结果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为0.000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商业文化传统独立地对现代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并非反映了其他变量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在列(8)中进一步控制了基础设施(lnroad)、教育水平(edu)、实际人均收入(GDP)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三个新加入的控制变量均不显著,但商业文化传统变量的估计系数降至0.0000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与前面的结论相一致,再次印证了本文假说是成立的。若以列(7)为例,通过简单的测算可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每增加1个标准差,则现代企业家精神变量将增加0.1641个标准差,故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不仅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大的。

表2 对假说的初步检验

模型	(1)	(2)	(3)	(4)	(5)	(6)	(7)	(8)
culture	0.0001*** (0.000)	0.0001** (0.022)	0.0001** (0.033)	0.0001*** (0.004)	0.0001*** (0.008)	0.0001** (0.013)	0.0001** (0.044)	0.00005** (0.047)
pop_n		0.0322*** (0.000)	0.0326*** (0.000)	0.0341*** (0.000)	0.0545*** (0.000)	0.0494*** (0.000)	0.0412*** (0.000)	0.0398*** (0.000)
MFI			-0.0010*** (0.009)	-0.0012*** (0.004)	-0.0011*** (0.007)	-0.0013*** (0.002)	-0.0013*** (0.003)	-0.0012*** (0.005)
struc				-0.0196*** (0.000)	-0.0200*** (0.000)	-0.0151*** (0.002)	-0.0118** (0.012)	-0.0128*** (0.010)
urban					-0.0225*** (0.000)	-0.0227*** (0.000)	-0.0221*** (0.000)	-0.0233*** (0.000)
f_p						0.0055*** (0.001)	0.0047*** (0.003)	0.0044*** (0.006)
trade							0.0048*** (0.000)	0.0044*** (0.000)
lnroad								-0.0007 (0.234)
edu								0.0992 (0.401)
GDP								0.0051 (0.234)
N	609	609	609	609	609	609	609	609
F	16.1044	15.0730	14.5889	17.5017	17.6057	17.3109	18.2263	18.1498
R ² _adj	0.2477	0.4618	0.4657	0.4840	0.5091	0.5210	0.5361	0.5369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2)所有模型均使用稳健性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3)所有模型因变量为spirit,且使用混合OLS进行估计;(4)所有模型均控制年度效应。

(二) 基于地方亚文化的分组检验

根据第二部分论述可知,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极盛一时的地方商帮文化作为商业文化传统有可能会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播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接下来,笔者根据不同的商帮文化划分标准,分地区检验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否对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商帮文化的地区与未曾出现过商帮文化的地区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首先,将十大商帮中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浙商、苏商、粤商和闽商划分到一组,同时将其他省份划分到另一组,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行(1)和行(2);在行(1)中商业文化传统变量的估计系数为0.00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行(2)中商业文化传统变量的估计系数接近于0且不显著,这表明,商业文化传统在历史上商帮文化非常繁荣的地区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更显著,再次表明本文假说是成立的。第二,本文还将十大商帮中最有名气的浙商、苏商、粤商、徽商和晋商划分到一组,同时将其他省份划分到另一组,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行(3)和行(4),这再次印证了本文的结论,即与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商帮文化的地区相比,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在出现过商帮文化的地区更大。第三,行(5)在行(3)的基础上还加入了陕商(或秦商)和闽商,同时将浙商、苏商、粤商、徽商、晋商、闽商和陕商划分到一组,并将其他省份划分到另一组,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四,考虑到中国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茶马古道”,本文将“茶马古道”涉及到的云南和西藏也划分到商帮文化组,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行(7)和行(8),这进一步印证了上文的结论,即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商帮文化的地区更显著。第五,本文还将31个省级地区划分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以及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基于此,检验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差异性,行(9)~行(12)的估计结果表明,商业文化传统在南方地区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在北方地区的估计系数,商业文化传统在沿海地区的估计系数显著大于在内陆地区的估计系数,这表明,中国地方商业亚文化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在南方地区或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更强的正向作用。最后,鉴于少数民族地区与非少数民族地区在商业文化传统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在行(13)与行(14)中分民族地区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在少数民族地区对现代企业家精神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它在非少数民族地区对现代企业家精神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再次表明,地方初始商业文化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确实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

表3 基于地方亚文化的分组检验

模型	分组依据	culture	P 值	控制变量	年度效应	N	F	R ² _adj
(1)	浙、苏、粤、闽	0.0006***	(0.000)	Yes	Yes	80	194.3337	0.9448
(2)	其余各省	0.0000	(0.286)	Yes	Yes	595	18.1502	0.5441
(3)	浙、苏、粤、徽、晋	0.0004***	(0.000)	Yes	Yes	100	213.1343	0.9591
(4)	其余各省	0.0000	(0.286)	Yes	Yes	595	18.1502	0.5441
(5)	浙、苏、粤、徽、晋、闽、陕	0.0005***	(0.000)	Yes	Yes	140	69.2490	0.8630
(6)	其余各省	0.0000	(0.286)	Yes	Yes	595	18.1502	0.5441
(7)	浙、苏、粤、徽、晋、闽、陕、滇、藏	0.0004***	(0.000)	Yes	Yes	160	51.5023	0.8296
(8)	其余各省	0.0000	(0.286)	Yes	Yes	595	18.1502	0.5441
(9)	南方地区	0.0004***	(0.000)	Yes	Yes	295	56.0589	0.8209
(10)	北方地区	-0.0002***	(0.000)	Yes	Yes	300	20.8114	0.5883
(11)	沿海地区	0.0004***	(0.000)	Yes	Yes	295	56.0589	0.8209
(12)	内陆地区	-0.0002***	(0.000)	Yes	Yes	300	20.8114	0.5883
(13)	非少数民族地区	0.0060**	(0.016)	Yes	Yes	595	12.7266	0.6641
(14)	少数民族地区	0.0000	(0.286)	Yes	Yes	80	18.1502	0.5441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2)所有模型均使用稳健性标准误进行统计推断;(3)本表所有模型均使用混合OLS进行估计;(4)控制变量包括GDP、MFI、pop_n、lnroad、struc、urban、f_p、trade、edu等变量。

(三)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进一步检验

商业文化传统会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那么现代企业家精神会不会逆向影响商业文化传统?这一点似乎很难想象,今天的现代企业家精神会对历史上的商业文化传统产生影响,故逆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似乎不会成为本文的计量难题。上文使用国民时期著名企业家人数作为商业文化传统(culture)的替代性衡量指标,但这有可能引致衡量偏误问题,进而影响到估计系数的大小及其显著性。基于此,本文接下来拟用工具变量法处理衡量偏误问题;当然,遗漏变量也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但本文中的工具变量法同时也有助于克服该问题。在研究思路,本文首先找到商业文化传统的两个工具变量,即1949年的地区商业经济发展指标和地区识字率变量;前者采用新中国成立初期地区商业贷款在农业贷款、工业贷款及商业贷款中的占比衡量,该比值越大则表示地区商业经济越发达,或者说该比值越大则表示地区居民做生意或做买卖的意识就越强,进而地区商业文化传统禀赋就越丰富,但1949年地区商业贷款占比指标对改革开放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发展似乎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且,本文在对现代企业家精神进行回归时已经控制住产业结构变量(struc),故该指标的设计符合工具变量的特征;而地区识字率反映了1949年中国各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商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水平的人力资本,事实上,商人的受教育程度在“士、农、工、商”中仅次于“士”的受教育水平,故地区识字率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文化传统的丰富程度,同时1949年的地区识字率除了通过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产生影响之外,很难产生直接的影响,并且,在对现代企业家精神进行回归时已经控制了教育水平变量(edu),故该指标也符合工具变量的要求^[19]。

表4 工具变量法估计

模型	(1)	(2)	(3)
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全样本
culture	0.0006***	0.0002*	0.0005**
	(0.001)	(0.062)	(0.03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年度效应	Yes	Yes	Yes
N	595	595	595
估计方法	IV	IV	IV
工具变量	shangye_iv	literacy	shangye_iv 和 literacy
F 统计量	16.93	17.31	21.51
chi2(1) P-val.	-	-	0.23

注:(1)***、**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P值;(2)本表所有模型均使用工具变量法(IV)进行估计;(3)控制变量包括GDP、MFI、pop_n、lnroad、struc、urban、f_p、trade、edu等变量;(4)F统计量用于检验是否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估计结果均表明无法拒绝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chi2(1)P-val.表示过度识别检验的P值,本表估计结果表明,工具变量均为有效工具变量。

基于上述分析,在表4中的列(1)首先使用商业贷款占比充当商业文化传统的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结果发现,与表2列(7)中的估计结果(0.0001)相比,在表4列(1)中商业文化传统变量(culture)的估计系数已经增加到0.000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若不考虑衡量偏误问题,则会低估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程度。列(2)使用识字率充当商业文化传统的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结果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culture)的估计系数0.0002,且在统计上显著,这与列(1)的结论相一致。列(3)同时使用商业贷款占比与识字率充当商业文化传统的工具变量进行IV估计,结果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culture)的估计系数0.0005,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假说。

并且,列(1)和列(2)均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见F统计量),列(3)通过弱工具变量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在此不再赘述。进言之,若以表4列(3)为例,通过简单的测算可发现,商业文化传统变量每增加1个标准差,则现代企业家精神变量将增加0.8209个标准差,故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在经济上也是非常大的。总之,表4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表明本文假说是稳健的。

(四) 其他各种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使用商业文化传统的其他衡量指标(即 culture1)进行稳健性测试,也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并且,当使用1993年或1994年各地区人均创业户数作为商业文化传统的替代性衡量指标时,本文的结论亦成立。此外,本文还使用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其他衡量指标(如 spirit1和 spirit2)进行稳健性测试,结果得出了类似的研究结论。本文还根据既有的研究^{[26][29]},选取自我雇佣比率、专利数量等指标衡量现代企业家精神,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限于篇幅,并未呈现这些估计结果。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经过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中国各地区早在建国之前就形成了各种独具特色的地方亚文化,31个省级地区的地方亚文化在横向上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这为本文探讨地方亚文化的横向差异影响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播和培育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亚文化更接近现代企业家精神,凡是在近代史上产生“商帮文化”的地区在精神实质上也比较接近现代企业家精神,而“农耕文化”繁荣的地区不利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影响但具体方向尚不明确。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历史上商业文化传统资源越丰富的地区往往也是拥有丰富的现代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地区,即现代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培育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此外,本文还基于商帮文化进行了分组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浙江、江苏、广东、安徽、山西等商帮文化比较繁荣的地区,以及在南方地区、东部沿海地区以及非少数民族地区,作为历史渊源的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发展具有更强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了衡量偏误问题。当本文使用1949年的地区商业经济发展指标和地区识字率变量作为商业文化传统的工具变量,进行工具变量法回归后发现,本文的研究假说仍然成立。本文的结论对于学界从历史制度遗产的视角理解中国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区域异质性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的不平衡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此项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本文的研究仅是初步的和尝试性的,尤其是关于商业文化传统与现代企业家精神变量的衡量问题仍需要在未来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第一,鉴于我国商业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家创新精神和创业精神的培育和形成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作为政策制定者的各级权力中心应积极挖掘和提炼商业文化传统中的精髓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元素,将商人伦理传统、创新创业理念与现代企业家精神的培育相融合,将创新创业战略与商业文化传承相结合;第二,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背景下,企业家精神的传承和重启尤为重要,这不仅关系到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成功转向创新驱动,还关系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就业稳定,当前亟需通过优化企业营商环境、保障企业财产权、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等供给侧改革手段重新激活商业文化传统中的企业家创业精神;第三,对于那些商业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企业家精神培育和传播的落后地区,在新形势下应积极鼓励商业文化的跨区域传播,借助优惠政策吸引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和商人将产业或企业落户到辖区内,同时还要搭建“政、商、学”商业文化传统传承和弘扬平台,提高企业家的参政、议政的机会,鼓励企业家参与政策的制定。

参考文献:

- [1] WEBER M.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M]. London: Allen & Unwin, 1930.
- [2] ZOU HENGFU.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and Long-run Growth [J].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10(2): 279-293.
- [3] TABELLINI G. Culture and Institutio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s of Europe [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10, 8(4): 677-716.
- [4] WEBER M. The Religion of China [M]. New York: Free Press, 1951.
- [5] 余英时.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20.
- [6] 杜维明. 新加坡的挑战: 新儒家伦理与企业精神 [M]. 高专诚, 译. 上海: 三联书店, 2013: 1-16.
- [7] 韦森. 从传统齐鲁农耕文化到企业家精神的创造性转化 [J]. 东岳论丛, 2004(6): 5-12.
- [8] 王晓毅, 朱成堡. 中国乡村的民营企业与家族经济 [M]. 太原: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1-10.
- [9] 胡必亮. 村庄信任与标会 [J]. 经济研究, 2004(10): 115-125.
- [10] 冯兴元. 地方政府竞争: 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 [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20-35.
- [11] 邵传林, 秦领, 邵姝静. 温州农村合会兴起的文化溯源 [J].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5): 28-33.
- [12] 邵传林, 邵姝静. 初始商业文化禀赋如何影响地区经济发展 [J]. 经济与管理, 2015(7): 30-37.
- [13] ALESINA A, LA FERRARA E. Ethnic Diversity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005, 43(3): 762-800.
- [14] ALESINA A, DEVLEESCHAVWER A, EASTERLY W, et al. Fractionalization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3, 8(2): 155-194.
- [15] 邵传林, 金立民. 商业文化传统如何影响了中国式制度变迁 [J]. 经济科学, 2015(1): 89-98.
- [16] INGLEHART R, BAKER W 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al Values [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0, 65(1): 19-51.
- [17] GUI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2): 23-48.
- [18] 朱锡庆. 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J]. 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6): 115-112.
- [19] 邵传林, 张存刚. 历史因素、制度变迁与现代商业精神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4(3): 81-92.
- [20] BISIN A, VERDIER T. Beyond the Melting Pot: Cultural Transmission, Marri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and Religious Trait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3): 955-988.
- [21] FERNÁNDEZ R, FOGLI A, OLIVETTI C. Mothers and Sons: Preference Formation and Female Labor Force Dynamics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4, 119(4): 1249-1299.
- [22] 李宏彬, 李杏, 姚先国, 等. 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J]. 经济研究, 2009(10): 99-108.
- [23] 江春, 张秀丽. 金融发展与企业家精神: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 2010(2): 62-70.
- [24] 李后建. 市场化、腐败与企业家精神 [J]. 经济科学, 2013(1): 99-111.
- [25] 邵传林.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金融深化与企业家精神——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J]. 中国经济问题, 2014(5): 3-18.
- [26] 邵传林, 韩磊. 转型期制度变迁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测度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14(5): 40-50.
- [27] 范子英, 张军. 败政分权、转移支付与国内市场整合 [J]. 经济研究, 2010(3): 53-64.
- [28] 张军, 金煜. 中国的金融深化和生产率关系的再检测: 1987-2001 [J]. 经济研究, 2005(11): 34-45.
- [29] GLAESER E L, WILLIAM R K. Clusters of Entrepreneurship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0, 67(1): 150-168.